



资阳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资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资阳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资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资 阳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资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资阳县印刷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定价：1.06元

目 录

·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		页
回忆“皖南事变”后我在《芜湖晚报》 的一次斗争……………	郭治澄	1
戎州狱中（诗两首）……………	郭治澄	12
革命烈士饶国华轶事……………	郑碧芯 舒代铭 徐雨	13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词一首）……………	师 中	20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感怀（词一首）……………	孔 武	21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词一首）…	石 垣	22
· 人 物 春 秋 ·		
疾风知劲草		
——记曹荻秋同志光辉的一生…	唐培安 徐树塘	23
附一：王一平在曹荻秋同志骨灰安放仪 式上的悼词		45
附二：女副市长		
——访曹荻秋的女儿曹晓兰……	漆启泰	48
曹荻秋中学时期二、三事……………	周嗣荣	54
曹荻秋早期的革命活动……………	徐伯荣	57
杨芳毓与芳毓楼…	杨庆傑 杨毓文 罗明萱 凌昌泽	65
关于杨芳毓先生的片断回忆……………	黄寿堂	73
· 风 云 录 ·		
难忘的岁月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琐忆……………	于 川	77

长生培德遗丰碑 ——夏长生、梁培德殉难经过纪实崔志贤 罗明萱 卿建英	86
· 肝 胆 篇 · 资阳解放前后民盟工作概述中国民主同盟资阳县支部委员会	92
· 艺 苑 史 谭 · 川剧高腔“资阳河”流派史话..... 李汝远 川剧高腔“资阳河”流派初探..... 蒋中菁	102 111
· 地 方 风 物 · 资阳八景..... 王永人 半月山大佛溯记..... 蒋中菁 马光宗	116 124
· 雁 城 旧 事 · 巷夜枪声 ——华骥被刺杀的见闻..... 段克敦等 妖道莫俦落网纪实..... 杨汝猷 枷号核子三月..... 马光宗 回忆青帮点滴..... 张国华	129 137 141 142
· 文 史 集 萃 · 冯玉祥赠联抨时弊..... 李振武 陈嘉庚提案警汪逆..... (据《重庆政协报》)	150 151

回忆皖南事变后

我在《芜湖晚报》的一次斗争

郭 治 澄

我是一九四〇年五月由党把我从四川大学调到宜宾工作的。当川康特委领导同志郑伯克向我交代任务以后，我考虑到今后我不大可能有回家的机会，便向组织上请假回资阳家中一次，在家里与家人团聚并埋葬了刚去世的嫂嫂（郭永江同志的妻子），到宜宾已是六月。开始是担任宜宾城区工委书记，十月后参加宜宾中心县委任宣传委员兼青委书记，分管青年工作。前几月没有公开职业，先在当地一个党员骨干王子健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又搬到一个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同志张伯康（非本名）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中心县委决定我应有一个公开职业作掩护，便由一位地下党员出面介绍我到当时由我党支持创办的《芜湖晚报》担任经济版编辑。《芜湖晚报》是抗战初期由当时那位社长向国民党中宣部申请登记出版、领到了登记证的。原计划在安徽芜湖出版，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没有创刊，于是在宜宾就利用这个登记证出了这张报纸。这个报社里除了我这个地下党员外，还有经理、记者、校对和工人中的几个党员，以及几个进步分子。其中担任校对的那个党员同志，就是我后任

的宜宾城区工委书记王志民同志。我把报社几个党员（不包括工人中的党员）和当地我党支持创办的一家书店的经理，编成一个党小组，这些同志在当地都算是属于中上层的文化人，就叫它文化小组，由我直接领导。《芜湖晚报》是民营报纸。其中我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占多数。报纸在群众中有些影响。但是报馆的四个董事中，只有经理徐祥达是党员，社长是个一般的国民党员，总编辑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群众，这两人都是在南京《新民报》里工作过的。那位社长颇想学《新民报》的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那样，办好一个民营报纸，闯出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是我们在当时可以利用的方面。还有一个董事，是当地中央银行里工作的小职员，对办报一窍不通，思想很是反动。应当说，这张报纸并不是我们党能够完全掌握的宣传阵地，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巧妙地利用它作些宣传，而主要是利用它安置我们一些党员和进步群众，使他们有公开职业掩护自己。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很好注意客观现实情况，报纸的政治色彩还是搞得太浓了些。在我担任经济版编辑那段时期，我利用城区工委领导身份，通过一些高级店员中的党员，了解到一些大商店、大字号的秘密，便在报上揭露奸商囤积居奇、高抬物价的行为，使得一些工商业资本家感到恼火，有的干脆不订这份报纸，拒绝在我们报上刊登广告，一度把关系弄得很紧张，报社的经济状况也更加困难。这种作法其实很不策略，后来感觉到了，才注意把关系搞得缓和一些。

《芜湖晚报》是晚报，每天中午发出。通常我是头晚用一、二小时把稿件编齐，划好版样，或者有时在当天早晨做完这些工作，就离开了报社，经常是要到晚上十时左右才回

到报社的宿舍。这对我们开展党的工作倒很方便，但也容易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于是，我就要几个党员同志编造我的新闻，说什么在某处、又在某处看到我和女朋友蹀达等等，我只是含笑不辩解，装做默认有其事的样子，以此来掩护我的活动。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为了削弱我党的力量，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方面命令我新四军军部等九千余人转移苏南待机渡江北上，一方面密令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及上官云相所部国民党军队七个师七万余人，在我新四军军部部队刚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于一月六日发起突然袭击，新四军在叶挺将军指挥下英勇奋战，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后续部队千余人突围外，副军长项英和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叶挺于一月十三日在与国民党军谈判停战时竟被扣押。蒋介石在其阴谋得逞以后，于一月十七日宣告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它部队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国民党的宣传机关中央社第一次发布所谓“新四军叛国”已被所谓“国军”包围解决的电稿时，我们报社收到这条电稿已届截稿时候，消息来得很突然，内容又很简单，没头没尾似的。报社的总编辑当即把这条消息扣下没有发表，并且告诉了经理徐祥达，徐祥达后来告诉了我。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新四军叛国”的事情，明明是国民党在搞反共高潮，想消灭或削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首先对新四军开刀。我们是民营报纸，不应当参加这股反共宣传逆流。在当时条件下，可以把这作为理由对国共两党的“纠纷”保持“超然”态度，拒不登载这类消息。当时大家都同

意这个意见。两天后看到了一月十八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有周恩来同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的报纸上还有几处开天窗。这些都表示我党对这一反动事件的严重抗议。和反动报纸的反动宣传消息对照，这次“事变”是完全证实了。于是我们在报社里进行串连，决定要抵制中央社消息，坚决不参与这个“反共大合唱”。

但是，当地的国民党报纸《金岷日报》第二天刊载了中央社所有歪曲事实的消息。国民党党部向晚报施加压力。报社开始是说：消息已成了旧闻，既已漏登，就没有补登的必要。国民党党部则坚持要我们必须补登，报社还是顶住不办。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我预料到国民党当局是不会罢休的，而且很可能接踵而来的是他们采用其它形式施加压力，那时报社处境就更困难了。就在这时，宜宾地方当局突然宣布成立新闻检查处，委派了个检查处长。宜宾一共只有两家报馆，而《金岷日报》是国民党宜宾专署的机关报，成立检查处的目的何在可想而知。那位检查处长初到报社拜会时，碰巧只有我一个人在，只好硬着头皮去和他周旋。那个家伙长得一副奸像，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听说这里（指宜宾地方）共产党活跃得很，你们察觉到了没有？”我只好若无其事地支吾过去。但是一场更尖锐的斗争将要到来，我是预感到了的。果然不几天后，住在重庆的蒋介石在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上，大肆宣传所谓“新四军叛国事件”，对我党我军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我们《芜湖晚报》又把这条“重大新闻”扣压不登，这就更引起了轩然大波。宜宾国民党党部勒令晚报必须全文补

登，态度十分严厉。我们答复不登的理由是，本报是民营报纸，没有必要登载有关党派斗争的消息。在当时反动政府法西斯专制统治情况下，我们的理由尽管正大光明，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那时除了我党公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拒登外，重庆的民营报纸差不多都登了这条消息（至少我看到的一些报纸是登了的），而《新华日报》不仅发行的报纸遭到了没收，报社的营业所也被特务、暴徒捣毁。在这形势发展不断恶化的局势面前，我们晚报的那位社长，表现得很紧张，几次反映说顶不住了，压力太大了，主张补登一下漏登消息应付过去。大家也都感到形势严重，少数群众表示沉默。

我也觉得形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中心县委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确定对策才行。于是在中心县委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在会上讲了我的看法：现在形势急剧恶化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应当认真考虑还能够利用这个报纸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应当坚持不登那类消息。目前，看来那位社长在外面压力太大的情况下，是顶不住的，那位总编辑在一定条件下是不能够违抗社长的意志的（因他是当地国民党报纸《金岷日报》的总编辑，在晚报是兼职，而《金岷日报》上是及时刊登了中央社播发的这类消息的）。我在会上提醒大家，形势会越来越恶化，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斗争，一方面也要考虑隐蔽在报社里面我们党的同志的安全，应当逐步撤出一些人员，以免形势到了十分紧急时陷于被动局面。可是我这些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大家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补登不补登那条消息上面去了。最后共同的意见是坚决不能补登，即使国民党封闭这个报馆也在所不惜。这形成了事实

上的决议，我要坚决执行。会后，我考虑了这样做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如何对付的办法。

第二天下午，那位社长找我个别交谈，他说：老郭，大家都要体谅体谅一下我的处境，现在我在外面受到的压力大得很。那条消息不补登一下是过不了这关的。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主张还是和他们磨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补登。社长听后就几个同仁（其中有我党的党员和进步分子）找来，重复说了希望大家了解他的困难处境，把那条消息补登一下的意见。他讲完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发言，实际是在等我表态。我觉得这是争取不发那条消息的最后一次机会，即使争取不成功，也要让大家受到教育。于是，我说了我坚决反对补登这条消息的理由。我说我们是民营报纸，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保持民营报纸的特点，不应当介入党派之间的斗争。再就是事情已经过去多日，再来补登，在新闻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我还说，这两条理由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说真的，我们的报纸不应当登这类消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办报的人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要站在公正的立场。八路军、新四军是真心抗战的部队，而有些人则不是认真抗战，专搞摩擦。如果我们登载这类消息，只能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我们不当作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情。讲到这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为了想进一步说服大家和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完全是“豁出来了”，继续说出了这样一些话：前年我在学校时，还曾经接到过一个同学从新四军里寄来的信，透过这信使我认识到他们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至今还激励和鞭策着我的良心，我们不能昧着良心给这支英雄部队抹黑。在我说了这些话以后，大家都没有发言，这是用沉默来

表示对我的发言的支持。这时，我感到我讲这些话太过头了。我也认为他们还是不发言为好，没有必要跟着我一起暴露出来。那位社长只是说，凭良心说他也不想补登的，实在是压力太大了。这不是什么会议（报社从来没有什么会议制度），也就这样不欢而散。虽然没有人赞成补登，但我还是担心：那个社长和总编辑是老同事，而那位总编辑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总编辑”（他手下别无助手），除了经济版他不管外，一、二两个版，包括国际、国内消息和本城新闻，都是由他一个人负责处理的，平时我们也没有过问那些方面的事情。如果在那位社长的一再恳求和施加压力下把这条消息补登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出所料，第二天晚报上，把蒋介石讲话全文补登了。我看到报纸后，很是愤慨，回报社时，看见有的进步群众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我心里也很难过。第二天我就提请中心县委开会，研究一下形势发展和应当采取的措施。

有个许久前就埋藏在我心里的想法，在上次会议上我忍着没说出来，这时觉得非说出来不可了。报社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早已多次对我提出，他们已发觉有人在监视我的行动。我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也有所觉察。我觉得我已经暴露了，种种迹象都可以说明问题。我之所以暴露，主要是：我进这个报社不几天，就碰上—一个在当地工作的川大法学院经济系毕业的同学。这个同学倒不是坏人，可是我是四川大学学生这个身份就公开了，而我在学校里是早已受特务注意和监视的对象。宜宾地处交通要冲，一九四〇年暑假和寒假，川大同学经过宜宾的很多，在宜宾碰到我的也不少，内中有两个特务学生还在报社发行部见过我，虽然

被我支吾过去，他们无疑是会断定我可能在这个报社工作，或者和这个报社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一个对我不利的因素，当时宜宾城区的党员大都认识我，而且知道我是成都来的大学生，其中好些人知道我在报社。这个报社经济十分困难，维持不下去，党叫我兼管会计和出纳，加强理财工作，我也曾通过组织关系授意党员在群众中推销这个报纸。许多地下党员知道这个报纸是我党支持办的，报社内有我们党员在活动。最引起报社同志和我注意的，是一九四一年初起，国民党中央在宜宾驻扎的唯一的一支武装——一个宪兵连的指导员（是下江人），将近一月多的时间里，每天晚上都要到报社来，找报社的经理徐祥达（也是下江人）聊天，一坐两、三小时，直到我回报社以后才走。我晚上回来时，常常是和他们点头示意然后走进宿舍，而这个家伙总是贼眉贼眼地对我目送一番。他还多次转弯抹角地打听我的情况。还有其他的可疑迹象。这次我向中心县委提出的中心议题，是认为这个报纸已经进一步暴露了，不宜继续安排那么多的党员在里面。对于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同志，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撤离，其中首先要考虑我的问题。我讲了我已经相当暴露的根据后，认为组织上应当考虑尽快把我调离宜宾，调换一个地方工作；或者暂时仍留宜宾工作，但必须迅速从报社撤出，辞去公开职务，时间上越快越好。可惜的是，我讲的这些情况和理由，没有引起同志们应有的注意和冷静的考虑。可能有的同志还怀疑我在严重的局势和困难面前被吓倒了，想开小差溜了。这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容忍不住。我说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我也不再考虑调离宜宾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写的文章中，

已经充分估计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动反共高潮可能造成的时局的严重性，提出了在白区工作中要坚持贯彻执行“隐蔽精悍，长期埋伏，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对急躁和冒进。这些精神肯定是传达了的，但是当时并没有传达到我们中心县委，我个人就记不得有这么一个十六字的方针。但是在到宜宾以后一段工作中，中心县委确实也曾对宜宾的组织状况作过分析，看到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横关系较乱，一部分人过于暴露等弱点和消极因素，也曾作过一些调整、疏散的工作。看来我们中心县委几个同志都是抗日战争高涨时期入党的，没有从前白色恐怖那段时期工作的经验教训，因而对党中央已有的指示精神领会不深，对“皖南事变”这一极其严重的警号麻痹大意。而我自己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看法和估计到事态的可能发展，但也是年少负气，没有反复耐心地申述自己的观点。那次讨论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结论和采取果断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晚十时，就是那次中心县委会议以后十天左右，我刚从县委机关回到报社打水洗脚的时候，突然报社的大门被推开了，国民党军委会战地服务团第六分团团团长李四荣闯了进来，狠狠盯我一眼直向内面走去。我感到情况不妙，赶紧揩脚穿上鞋子。这时报社社长十分惊慌地出来对我说：李四荣要找你谈话。我说我不认识他，有什么可谈的。他说：“你自己心里有数。”我说：“好，谈就谈吧！你叫他来。”李四荣来了，装着很客气的样子对我说：郭先生，你和刘先生很熟，我想找刘先生商量一件事，请你告诉刘先生住的地方，我好去找他。我立即意识到敌人是想破坏我们中心县委机关，抓我和中心县委张文澄同志

（当时党内叫他老刘）和其他同志。我很镇静地回答说：你搞错了吧，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刘的。这个家伙立即以进攻的语气说：你是认识的，你们不是常常在王述成家里碰头开会吗？我装着很生气的神气，很不客气的说：哪有这些事，不认识就不认识，你这人真怪，硬说我认识。这个家伙原形毕露了，他威胁说：你不愿意说，就要委屈你了，那就请郭先生和我们走一趟！我立即质问他：这是什么话？是要逮捕我吗？我犯了什么法？你把逮捕证拿出来我看看！李四荣也气势汹汹地说：你要识相点，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在对话中我留意看看门外，见到有持枪的士兵向内窥视，还有士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知道已被武装包围，走不脱了。我于是说：好吧！走就走！接着又说：且慢，我还有事要交代一下。那时，我还兼任报社的会计和出纳。我把帐本、钥匙交给了经理徐祥达，说：我手续算是清了，请放心！这最后一句话语气很重，是向大家暗示，要大家不要惊慌。然后持枪的士兵把我押走了。

（编者按：作者郭治澄，原系资阳县城关镇正东街人。家住黄泥井斜对面廖家巷子隔壁。生于一九一八年，歿于一九八五年，终年六十七岁。早年先后在资阳弘文学校、县立中学（今资阳中学）初中第八班、成都县中高中部、四川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川康特委调郭治澄同志到宜宾中心县委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件”后不久被捕入狱，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在日本飞机狂炸宜宾时，与狱中难友一起打监逃出。

新中国建立后，郭治澄同志历任《长江日报》社副总编

辑、总编辑、党委书记、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市委顾问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委党史征集编研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本文节选自作者《炼狱六月纪实》。全文共四部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本刊今年特选载第一部分，现标题是奉会加的。发表时对原文略作订正，并经郭治澄同志审阅。）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

——李世民

戎 州 狱 中(注)

郭 治 澄

(一)

志士不忘在沟壑， 勇者蜀虑丧其元。
文山正气昭日月， 閩部英灵铭逝川。
泪洒江南千古恸， 捷传晋北万众欢。
我志未酬胡何憾， 愿以我血荐轩辕。

(二)

革命由来用血书， 凛然大义志若初。
科伦雄辩喋群竖， 莱城宏辞屈独夫。
誓换乾坤奋旗鼓， 宁殉真理抛头颅。
人民不死山河在， 后笑终当有子胥。

注：这是郭治澄同志一九四一年在宜宾狱中写的两首诗。据作者回忆，他写了第一首诗后，感到意有不足，应着重效法马克思、季米特洛夫这些革命领袖，因而又写了第二首诗。